世新中文研究集刊　　第十期
2014年9月　　頁33-54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特載】

後現代視閾下文學理論的語義拓展

趙建軍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江蘇，無錫，214125）

摘　要

後現代視閾下文學語義的探索，凸顯出一種對傳統視界及相應話語平臺的突破。這種悖離並沒有完全改變以往文學理論的存在方式，但借助於語義與媒介的合謀實現了語義蘊含的顛覆。本體語義的意識形態化闡釋，堅持體現當代人性本眞與現實性的統一，並因理論場閾的擴張而實現了意識形態化的話語增殖。拓展到非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學語義，則在“圖像語義”、“敍事語義”、“意象語義”方面多有掘進，對中國文學語義的本質、構成也取得很多有效的探索。但總體而言，後現代視閾下的文學語義研究，以針對現代性語義症候的揭示爲主，眞正轉換爲後現代語義的研究還不夠充分，爲此文章論述了後現代語義的邏輯基礎、關鍵問題及對未來的語義拓展問題，認爲在宏觀邏輯與文學自律性語義的轉換性研究中，通過語義對壘的方式，可以深化中國文學語義的時空分延，使後現代語義的未來拓展成爲可能。

關鍵字：後現代視閾；文學理論；語義；拓展

Semantic Expansion of Literary Theory Under Postmodernisms View

Zhao jian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Jiangsu,214122）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semantic under Postmodernism views,reveals a kind deviation to traditional horiz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discourse platform. This deviation is not completely change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literature theory, but subvert semantic connotation with the help of semantic and media. Ideology explanation of ontological Semantic,adheres to the embodying of unity of contemporary human nature and reality, and realizes the discourse proliferation of ideological literary due to expansion of theoretical fields. Literary semantic expansion in the in-ideological, made a lot of effective exploration in" image semantic "," narrative semantic "," idea semantic",and Chinese literature semantic essence. But overall,postmodern literature semantic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ly a status that mainly expressing in the answers of modernity symptom,no truly converted to postmodern semantics reasearch.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ogical basis,key issues and the expansion future semantic of postmodern literary,states that the literature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macro logic and the

self-discipline,can deepen the time-space distinguishable extens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emantic,implement the possibility of expansion future of postmodern literary semantic.

Key words: Postmodernisms View; literary theory; semantic; expansion

後現代的理論和文化，對中國文學理論作爲一種思想資源，主要體現爲理論視閾上的吸收和借鑒。後現代視閾下的文學語義研究，是文學理論研究的一部分，由於引入視閾的龐雜、寬廣，使語義討論的內容與現代性視閾下對“差異性、矛盾性和內在衝突”[1]的意義關注形成區別，相比之下，後現代視閾的語義研究更重視話語的“解構”意願，並通過話語的繁富存在凸顯其對文學意義的維護意識，因而具有別種知識建構的意義。

本文對後現代視閾下文學語義的研究，進行基於語義研究事實的判斷敍述，及語義研究相關問題的討論。本文對語義的分析，借用了語義學的若干概念，但對於語義認知的邏輯分析和研究狀況的判斷則主要基於文學研究的事態，在某種意義上，語義拓展問題既與文學理論的宏觀策略具有深層邏輯關聯，同時也觸及文學實踐的現實狀態及其內在本質。

一、語義悖離：顛覆是否成立？

文學語義深層邏輯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有沒有與傳統的視界及語義邏輯拉開距離，甚至相悖離，這是考察文學語義推進與否的一個前提，如果文學語義的進展是悖離傳統視界及其邏輯的，那麼，就意味著文學的核心價值觀念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反之則不然。如果文學語義對傳統的悖離是根本性的，則意味著後現代視閾下文學語義的研究，實現了對傳統語義的顛覆性推進。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文學語義的主導觀念是意識形態性的，這種意識形態的邏輯模式，體現爲康德式的“先在性”（priori）綜合預設，即將純直覺納入先在性知識構成—先驗邏輯（transcendental logic）之中[2]。意識形態的語義邏輯構成來源是多重的，既有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一般設定，也有基於直覺體驗與分析得來的關於“審美性”、“文學言語”特性的

[1] 周憲：《現代性視域中的當代美學問題》，《中國圖書評論》，2006 年第 7 期，第 42 頁。
[2] J. Alberto Coffa.The semantic tradition from Kant to Carna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P18.

設定。後現代視閾下的文學語義研究，始于對文學的意識形態語義邏輯向後現代境遇下文學生存模態發生轉換，有了明確的認識。有學者說：“後現代時代是一個感性肉身的時代，是個強調肉身安頓大於精神安頓的時代，是一個圖像符號取代文字文學的時代，是一個讀圖時代大於讀文時代的圖像學世紀。”[3]有學者總結說：“文學遭遇‘圖像時代’的問題是當下學界十分關切的問題，也是學術熱點之一，特別是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早已被翻炒得炙手可熱。”[4]對文學遭遇“後現代”的眞切描述，反映了基於後現代視閾對文學存在境遇的省思，這種反思促發了當代文學語義對傳統文學語義的深度悖離。

文學語義的省思拓展了文學本體語義的內涵。1980 年代以來，關於文學本體語義的提法有多種名目，如“人類學本體論、生命本體論、活動本體論、藝術本體論和反映論本體論、意識形態本體論、理性本體論、語言本體論、否定本體論”等等[5]，各種提法中“審美意識形態性”的提法於 1992 年納入童慶炳主編的面向 21 世紀大學教材《文學理論教程》，產生的影響較廣，可以說作爲一種官方提法，一直起著主導性作用，影響著文學本體語義的理論闡釋。所不同的是，到了 1990 年代，對“審美意識形態性”的語義闡釋由根據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觀點立論開始向結合歷史來闡釋語義轉化。有學者結合中國審美發生的歷史談審美性的生成[6]，2000 年出版的《新中國文學理論》一書，就文學核心語義的理解提出一個判斷，認爲已經不再圍繞“社會生活”這一中心來確定文學思想：“在特定情勢下，受不同的利益驅動和精神追求的影響，各種各樣的文學觀念大量湧現，因而，不同層次、不同集團的人對文學的看法發生很大的變化，同時對文學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

[3] 王嶽川：《後現代“文學性”消解的當代症候》，《湖南社會科學》，2003 年第 6 期，第 129 頁。

[4] 趙憲章：《文學和圖像關係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江海學刊》，2010 年第 1 期，第 183 頁。

[5] 錢中文、吳子林：《新中國文學理論六十年》，《社會科學戰線》2010 年第 4 期，第 161 頁。

[6] 錢中文：《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邏輯起點及其歷史生成》，《文學評論》2007 年第 1 期。

作用也作出不同的安排。……既然對於文學的思想和理論表述已經離開社會生活的‘中心’，那麼，在大體原則一致的條件下，就可以‘和而不同’了。”[7]表明儘管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原則爲學界所共同遵守，但對它的理解卻在突破傳統視界的基礎上開始了對原來涵義的“解構”，儘管這種解構是局部性的，卻撼動了前提性的文學語義邏輯基礎，使之向涵容不同性質的語義邏輯基礎轉化。

在這個轉化過程中，現代性問題與文學本體語義交織在一起，爲構築文學語義的元命題，建立文學理論的新體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現代性以理性思維解決“文學性”問題，包括結構主義語義學、形式主義語義學和存在主義語義學等學術流派，都十分關注文學語義的自律性問題。例如，文學系統的結構與模式問題，文學的“陌生化”與“自動化”問題，以及文學的詩意價值問題等，都涉及文學自律性存在的本質與內涵。現代性對傳統視界的政治意識形態和以經典論斷爲“先在性”理論前提是十分反感的，從而透過現代性的理性批判可以把握到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整體顛覆意圖，但現代性及其觀念系統也具有形而上學性質，而且正是通過這種形而上學的觀念獨斷與邏輯統一性將現代性諸問題與文學語義交織一體，當代人生、文化所面臨的各種困惑和矛盾，通過現代性的文化、哲學、美學、歷史、語言學、倫理學探討與文學自律性問題交匯雜糅起來。正是在這裏，文學語義理解與闡釋的後現代視閾得到凸顯。原因是文學語義通過那些現代性問題的探討，讓新的語義不斷綻現出來，像主體性、交互主體性、主體間性、客體肌理——結構、所指、能指、複製、大衆化、日常生活、語象、語境化、文本、本文、多元化等概念，都包含著不同于傳統視界的嶄新語義，它們是負載文學新語義的新生成的概念。由於新語義的不斷綻出，對文學本質的思考就逐漸地由普遍原則的討論轉向文學存在本質及其話語呈現方面，致使文學語義的整體顛覆意圖也表現在這種轉化上面：是繼續捍衛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原則，還是

[7] 童慶炳、許明、顧祖釗主編：《新中國文學理論 50 年》，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0 頁。

尊重文學的對象性存在，對文學的話語構成及其蘊藉給予更多關注。顯然，轉化的結果是更傾向於對後一方面內容的關注。可以說，文學現代性問題與文學性問題的討論深化了文學語義研究，使文學理論的語義內容更趨細化和豐富，從而眞正地趨向了學科化建設。

從表面上看，現代性問題並不是後現代研究的對象。但後現代視閾爲現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論背景，使得中國文學語義的判斷和闡釋空前的現實化、當代化了，從而與後現代的學術意識形成了某種潛在的關聯。例如，話語語義研究所表現出的後現代語言學認知背景和向話語自律性特質轉向的明顯傾向。對現代性語義轉向文學言語的“能指差異”和文本語義的研究，有學者揭示其西方語義學背景，是一種“後結構主義的思潮，以本維尼斯特和福柯等人的理論爲代表，從語言向話語的轉變，凸顯了話語主體行爲、表意實踐和話語規訓等問題。”[8]同時，在中國文學話語的自律性特質方面，也擁有了不同于西方現代性語義研究的目標和重點，譬如：1.“話語蘊藉”問題，通過古代文論轉化而來的“蘊藉”一詞，涵括中國文學話語獨特的“詩性”與“詩意”，成爲揭示中國文學話語特質的一個重要概念；2.“話語結構”問題，近年來很多論著圍繞著話語結構展開研究，探討的內容涉及宏觀性的語義結構，如美與醜、滑稽等的話語結構呈現問題[9]、歷史與現實的話語敍述結構問題[10]，“文學場”的符號結構問題[11]等的研究；也有一些涉及微觀語義結構的辨析，如漢語詞語結構問題[12]、敍事結構和意象結構問題等的研

[8] 周憲：《文學理論：從語言到話語》，《文藝研究》2008 年第 11 期，第 5 頁。

[9]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研究，及運用對話理論對《西遊記》話語風格的研究等，如秦勇：《論巴赫金“丑角地形學”的生成機制》（《河南社會科學》2003 年第 2 期）。

[10] 話語現代性的研究，及結合文本話語展開的文學思潮研究，如楊春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是啓蒙主義——現代性視野中的五四文學》（《廈門大學學報》2003 年第 5 期）。

[11] 對文學的文本場閾和理論場閾的研究，對文學場的內部空間結構的研究，如朱國華：《轉智成識：論文藝學的邏輯出發點》（《文藝爭鳴》2008 年第 5 期）、《顚倒的經濟世界：文學場的結構》（《天津社會科學》2006 年第 6 期）。

[12] 對中國文學的語象研究，如趙憲章對陸文夫小說《美食家》的語象分析，及近期關於圖像研究中涉及的語象討論。

究[13]。3.“話語實證”研究，著重從調查和實證入手發現理論問題，或以實證研究作爲理論之驗證的研究。

綜上所述，由悖離傳統視界而形成的文學語義突破，使中國文學理論客觀上顚覆了以抽象原則、經典語錄爲“先在性”邏輯基礎的文學觀念和思想體系。文學語義與現代性問題的融聚以及話語研究的多層次展開，使文學語義成爲文學理論的核心學科內容得到充實和拓展。在細微化方面，文學語義研究較之一般的範疇研究更有針對性，也更富有思辨性和實證性，這是當代文學理論的一個重大轉向，但對於語義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所導致的理論構成的顚覆，也要有恰當的認識，因爲這種顚覆只是從語義主體內容的性質轉向及所接受的後現代視閾影響而論的，實際的文學語義研究還有一些涉及到的後現代語義問題，並沒有充分展開，如碎片化和言語形式的分延問題。因此，對後現代視閾影響下的當代文學語義研究，也應當基於這樣的認識，來把握它的研究實績和存在的問題。

二、“凸鏡”與“凹鏡”：文學語義的拓展

語義拓展是文學研究的一種特殊現象，當語義眞值與多個資訊簇聯結，並由一個資訊簇過渡到另一個資訊簇的核心時，便實現了語義拓展。中國文學理論對西方文論的引進，在近三十年是高度集中的，不僅古典文論，而且包括現代文論和後現代文論一起湧入，以致我們感到中國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裏，走過了西方文論一百五十餘年的歷程。這個看法是毫不誇張的，因爲在文學理論研究的各個層面，語義拓展將最富眞值意義的概念、命題揭示了出來，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經過語義的過濾、熔鑄和轉換，可以與西方最流行的文學理論進行對話。

[13] 對敍事與意象的話語結構研究，既觸及到中西話語比較問題，也觸及到中國文學古今話語特徵與結構的解析，2000 年以來，進入這方面的學者很多，專著和論文成果也相當豐富，其中楊義《中國敍事學》即從結構分析入手，特別對敍事與意象的話語結構進行了充分的分析。

那麼，體現于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中的語義拓展，必然有其跨越不同視界的主脈，它們不僅反映當代文學理論最有貢獻的成果，而且是現代、後現代語境之下，特別是後現代語境下應對文學理論現實問題的結果。概言之，文學語義當代拓展的主脈主要有兩條：一條是以意識形態意涵的擴張促成的文學語義由經典跨越到後現代視界，進而形成了宏觀勢態的多元化語義研究格局；另一條是以文學自律性的研究聚焦所實現的文學內部涵義的話語增殖。對於前一種，我們用“凸鏡”來形容其資訊外張的狀況，後一種則用“凹鏡”來形容語義向內聚攏、集中的狀況。

文學語義的“凸鏡”呈顯，是文學語義突破政治意識形態的單一、普遍性意涵之後，由確立後結構語義性質的意識形態本體語義，過渡到具有現代性矛盾張力與內核爆裂的意識形態語義擴散，再進而拓展到非中心的意識形態化語義討論。

（一）本體論語義的意識形態化闡釋。傳統視界的文學語義限於單純詮釋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論思想，而將意識形態理解爲絕對化的、權威化的理論範式。針對傳統視界的封閉、單一所造成的文學語義與現實生活，特別是人的眞實境遇相脫離的境況，國內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將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語義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實踐本體論結合起來，構建以存在論爲核心的文學本體語義觀，完成了文學語義的馬克思主義現代化、中國化的理論拓展。有學者指出：“海德格爾正是以‘此在’之‘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爲切入點，以‘藝術作品’（Kunstwerk）和‘眞理’（Wahrheit）爲橋樑，以一種完全非形而上學化的話語系統言說‘存在’，也由此營創出了現代哲學的新天地。……馬克思則實際上肯定了人的實踐活動否認邏輯優先性和基礎性（並非時間上的先在性）。借助于這種優先性和基礎性，人建立起了自身在存在論領域內的主體性（康德建立起了認識論領域內人的主體性），一切存在問題只有在人的社會歷史實踐， 人的生

存活動中才能以正當的方式被提出和被思考。”[14] 馬克思主義存在論也是意識形態性質的語義“先在性”設定，將海德格爾存在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美學原則聯結起來，在語義邏輯上就實現了把抽象的意識形態化的“人”向“現存世界”的、具體的人的轉換。提出這一主張的學者，在與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與海德格爾存在論結合起來的主張者對話時，進一步明確說：“對實踐概念的這種理解來自馬克思的原著，並不是筆者的任意解釋。這是筆者提出實踐存在論美學的前提和依據之一。”[15] 對“實踐”、“存在”語義的討論，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現代美學本體語義的聯結，“實踐存在論”的提法符合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化語境，它強調了文學審美以從人的實踐存在爲本體[16]，這對於建立文學語義上“人”—“世界”—“藝術”的本體論統一是十分重要的。

本體語義的意識形態化闡釋，在實際操作時必然面對是澄清誤解還是超越原有觀念的矛盾。保守的本體語義闡釋，經常表現爲唯經典主義和教條主義，表面看似乎恪守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美學和文學的基本原則，但實際上經典語義即便作爲邏輯意義的“先在性”基礎，也是在闡釋中完成的，即經典語義若不能做到闡釋語境的引入當下，便不可能凸現經典語義的邏輯眞值。至於對經典語義的拓展性闡釋，乃是將經典語義的內涵和外延應對了當下的

[14] 朱立元：《海德格爾凸顯了馬克思實踐觀本有的存在論維度——與董學文等先生商榷之三》，《社會科學》2010 年第 2 期，第 101，111 頁。

[15] 朱立元：《全面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概念——與董學文、陳誠先生商榷之一》，《上海大學學報》2009 年第 5 期，第 91 頁。

[16] 經典作家的理論研究必然有自己的闡釋。像馬爾庫塞就曾提出“海德格爾式馬克思主義”（Heideggerian Marxism，by Herbert Marcus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認爲海德格爾的馬克思主義，是通過反對工業社會的技術進步及其具體化而實現的社會革命，由於馬克思對於對象性有深刻的闡述，對主體性，即人的存在有所忽略，從而海德格爾與馬克思主義能夠形成互補。馬爾庫塞的“海德格爾式馬克思主義”顯示了激進的社會批判意識，顯然包含著濃郁的闡釋成份，但他的觀念是應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而“實踐存在論”則體現了尊重人的存在論基礎與優先性的問題，這對於將文學中的人置於寬泛的、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化的人的理解，顯然具有理論意涵拓展到當代的意義和價值。

語境，有其現實的語義對象“場閾”，從而才使經典語義變得較之原經典文本所闡釋的語義蘊涵更爲豐富，這些豐富了的觀念、命題，乃至體系，即便與經典原本中的語義似有所脫節，它也是受經典語義的啓發後與當下語境、對象因素觸遇的結果，其基本精神仍然符合經典語義的意識形態性質。當代文學理論的語義研究，要堅持一種體現當代人性本眞與現實性眞值的意識形態觀，避免那種割裂人的現實性而單純進行的玄學式烏托邦語義思辨，譬如所謂後實踐的自由觀、生命觀，表面看似乎在宣導當代人生的價值眞義，但實際上精神實踐並不等於社會實踐，抽象的價值超越並不能充分呈顯人的存在性與現實性。意識形態語義的存在性與現實性並不矛盾，當代學者也有提倡文學的本體語義是非意識形態性的觀點，這種主張中有的將文學存在從意識形態語境獨立出來，宣導一種文學審美性超越人的現實性、存在性的語義眞值。但我們很難設想有這樣的文學眞值存在，因爲文學的語義眞值並非封閉系統的文學自體所給予的，它必然地要與社會、文化及其他的媒質產生資訊碰撞。文學語義是諸種資訊形成碰撞、匯流性“場閾”後，由話語規則所擇定的一種意義函數。在文學語義的資訊源與在場變數和最終的語義擇定之間，存在著多種闡釋可能，正是這種闡釋的可能性使我們在邏輯上可以把文學的自律性話語表達獨立出來，認可其話語語義的眞值在場，也可以把非中心的文學語義資訊視爲非意識形態化的存在，但意識形態化的語義始終是文學語義的一個在場性主脈，是文學理論無法回避的一個“場閾”。意識形態化闡釋，一般以集中表達社會的權力理念爲其眞值，在現代化境遇中，這種眞值因理性範式的僵硬和獨斷，越來越暴露出很多的問題。而在後現代語境下，意識形態化的闡釋便由傳統社會、也包括現代性的權力理念，開始向社會大衆和普通人的生存意願轉移，從而後現代境遇下的意識形態語義闡釋，在價值眞值的提出方式上，便有可能與傳統視界和現代視界明顯悖離，如有的學者提出“生態存在論”的本體語義觀，認爲“人的現代性歸根結底是人

的生存層次的提升。”“只有文學及其所蘊涵的美學精神……才使人的存在成爲詩意的存在。”[17] 這種觀點就其邏輯眞值看，是否定人類中心論，是將現代性作爲反思的內容，以自然對人的生態學意義爲基旨，主張文學與自然、世界的生存（存在）價值的平衡和統一的觀念，其語義內涵對文學的影響是促成由現代性到後現代境遇的理論拓展。“生態存在論”語義著眼的依然是人的生存和存在問題，它消解了意識形態的僵硬主體性，表達了後現代境遇下的現實性和存在性宏觀意願，可以說是一種後現代方式表達的意識形態語義在場。

（二）意識形態化的話語增殖。把意識形態問題，透過歷史語境和現實語境，向人的現實生存、心理，以及所遭遇的生存阻抗等方面掘進，便使文學語義的意識形態問題，由宏觀性觀念思考轉化爲糾結著諸多現實性內在矛盾的話語表達，特別是在網路普及、全球化傳播、欲望與暴力被各種符號演繹、文學審美日常生活化等問題被提出和關注之時，過去以體制性意識形態爲權威觀念並由此設定語義界限的情況，就自然而然地趨於化解了。意識形態化的話語表達，借助資訊化、商業化、市場化的無所不在，呈現爲話語性“場閾”及其相應“效力”的眞值判定。

“場閾”即在場性及其範圍。文學語義的場閾，是一種理論場閾。曾一度存在的政治場閾或體制性意識形態場閾，使文學語義基於社會認知而得到定義和解釋，而後隨著文學自律意識的覺醒形成的“形象性”、“情感性”、“審美性”、“符號性”等語義闡釋，也是基於普遍本質的“先在性”而被賦值的，因此雖然這些概念很具體，但不能說擁有文學語義的話語表達場閾。“隨著消費社會的來臨，所有這些闡釋文學性的途徑和線索都逐漸失去了理論的有效性。後現代文化對現象與本質、感性與理性、邏輯與隱喻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背反恢復了文學的詩性之維。文學既不是道德情感表現的工具，也不是與現實世界全然無關的符號體系。在功能問題上，文學藝術高舉感性

[17] 曾繁仁：《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20，224 頁。

衝動的大旗，堅決反對康德以來的‘審美無關功利’說，解構著藝術與現實、審美與功利的界線，不斷向感性、向商業性靠近與融合降解。種種跡象表明，傳統文學性概念的各種界定方式和闡釋途徑都陷入了一種悖謬性的境地之中。重釋文學性，重建文學理論的話語系統，已經成爲當代文藝學最爲緊迫的理論使命。”[18] 於悖謬處境中“重釋文學性”，表明現代性症候凸顯于文學語義話語的不同方面，從而促成話語語義的“場閾”大大突破以往權威性“話語”場閾。在這種文學語義話語“場閾”的擴張中，意識形態語義的話語擴張仍然是強有力的一個“場”。一方面，人們不再簡單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語義的權威性與合法性，對執守經義是否“純粹”，合乎“原旨”，至多視爲“一家之論”而容許其發言存在，另一方面，對“解構”性主張也持寬容態度，就像黑格爾所說的否定因自“他者”向“自身”的轉化，“解構”也是語義發展的辯證軌跡。由於意識形態話語“場閾”實質性地形成，便使文學語義獲得從未有過的涵義增殖。而在語義的話語“在場”及其增殖過程中，也逼迫大量原來的含義連同其表述退場。例如，關於文學與欲望的關係，先前多傾向於將欲望視爲非精神性而予否定，後來汲取叔本華、佛洛德理論到意識形態化的語義話語詮釋，欲望就成爲昇華的本體對象和內容。在其他概念上也存在類似情形，如在拉康、阿爾杜塞理論被用入以後，“鏡像”、“想像性虛構”等概念，便造成馬克思主義文學語義由主流形態到非主流形態的進一步擴張。福柯、德里達、桑塔格、洛奇等的文學語義觀念，進一步凸顯了文學語義的意識形態特徵，使文學意識形態的社會性與價值感獲得了感性生存域的趨勢支撐，並在導入全球化境遇中實現文學語義的話語眞值抉擇。

“效力”問題是文學語義的現實性與價值性如何趨於同一性的問題。理論的效力不是行政效力，它不爲現實的文學提供操作法則，理論的效力是對文學在場性的一種解蔽。換句話說，把原本沒有說的或說不出的變得說出或

[18] 曹順慶，支宇：《重釋文學性——論文學性與文學理論的悖謬處境》，《湖南社會科學》2004 年 1 期，第 130 頁。

可說，就是理論效力的一種現時性發揮。語義效力居於文學話語的中心地位。文學語義的拓展惟有從底部，從人的生存，人的欲望底部著眼，將之導入意識形態的大場閾，使欲望與現實產生的各種碰撞在價值觀的解析中得到合理的流向，方是文學語義意識形態性的所在。在文明與罪惡，歷史與反動，建構與建構之間，話語增殖暴露出語義的深層矛盾。暴露是一個前提，在暴露的基礎上使語義導向價值之域，則是一個更根本的規則。譬如拉康，他對鏡像的理解，不斷析出新義，每一次新義都對舊義形成顛覆。但在拉康的“幻象”否定中，對生命中遭遇壓抑的本質東西始終關注其昇華的合理性，從而拉康的話語增殖在立體生成中具有其總體流向的明確。否則，單純昇華欲望是危險的，因爲“任何對動物性的昇華企圖都導致差異性的爆顯，潛在地脅迫著由壓抑之所返歸到帶有力量和權力症候的結構。”[19] 中國文學語義的話語增殖也是這樣，隨著現代性話題逐漸遷轉到後現代消費語境，顛覆意圖必然在各種矛盾意向重重交鋒中空前鋪開，而此時意識形態性的“顛覆”指向，還應該是文學自律性價值與總體文化性價值的同一，否則任何單純立足於欲望的“後結構”構建的主張，都會帶來對文學潛在的脅迫與傷害。

爲此，我們有必要就語義拓展到非意識形態性的情形有所考察。作爲“凹鏡”的文學語義拓展，立足于文學獨立性的“先在性”（Prori）問題思考，在跨越到新世紀之後，以“圖像語義”、“敘事語義”、“意象語義”的思辨與解析，構成從現代性跨越到後現代場閾的重點。

圖像語義研究是近年來文學語義研究的一個重點，據相關統計，2001 年以來“像”與“象”在文章中出現的頻率很高，“對圖像的關注幾乎是爆發性的增長”[20]。圖像原爲繪畫領域概念，引入文學研究領域涉及圖文關係及文學圖像的語義問題。對於圖文關係，近來學界的最新成果認爲圖文關係反映著詩畫關係，兩者存在著“互仿性”，而就“互仿效果而言，卻存在非對

[19] Erin Felicia Labbie.*Lacan's Medieval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P90.

[20]《敘事・符號・圖像：當代文化景觀三人談》，見：http://culture.ifeng.com/1/detail_2011_06/28/7298510_1.shtml

稱性態勢:圖像模仿語言是二者互仿的‘順勢’,語言模仿圖像則表現爲‘逆勢’。”[21] 語言符號的“實指”和圖像符號的“虛指”性質，決定了在實際文本中語言處於強勢地位，“當二者共用同一個文本，就有可能導致語言對圖像的解構和驅逐，或者延宕和遺忘。”這是就圖像植入文本後造成的語義效果而言的。文學在消費社會與圖像的廣泛結緣，是意義的一種弱化和淡化。根據該最新成果的觀點，圖文關係中圖像處於弱勢地位，並不能撼動文學自身的語義表達，反而消解著圖像語義，“崇文抑圖”是符號本身語義表達的一種客觀化效果，那麼在文本中植入圖像，在增強閱讀可感性的同時，並不會影響文學自身的表現力。現代性符號理性與後現代“讀圖”感悟形成文本的語義交叉，是一值得深思的現象。而另一種情況是，文學圖像概念特指深入文字內層的語義圖像，當文學在電子時代與各種空間形成互動關係時，“看不見”因素在文本內的“看見”，就成爲文學語義的一個新主題。城市生活在視覺接受基礎上生成複雜多變的空間結構，這些結構不僅使可能性和現實性變成具有活力的物化、可視性元素，而且使人內心世界的幻想、臆想及欲望的繁多表像和變態想像都成爲文學內在語義的構成因素。一旦文學語義造成實質性地向圖像（或可以借助視覺媒體轉化爲眞實圖像）轉化，則現實性的文學語義解構就由過去的實指性文學言語向虛指性的、帶有意識形態欺騙性的圖像性言語的形態，其結果是造成文學意義的整體消減，有學者稱這是一種“圖像霸權”或“欲望消費化”[22] 態勢。我們以爲，文學圖像語義由傳統的圖文各體到現代的互仿共用，再到圖像性言語的活化生成，反映了文學由傳統的獨立自成向非獨立生成的轉變，在轉變中文學語義通過圖像的言語化和文本言語的圖像化，使文學語義呈現與外部空間立體化的對接，並將人的內在世界通過言語圖像的視覺化，生成爲可以與外部空間對流的活性因素，這是文學後現代生長性的一種體現。各種現實、文化理解均可以進入文

[21] 趙憲章：《語圖互仿的順勢與逆勢——文學與圖像關係新論》，《中國社會科學》2011 年第 3 期，第 171 頁。

[22] 王建成：《圖像的霸權與闡釋的拯救》，《社會科學家》2010 年第 8 期，第 30 頁。

學圖像語義，筆者曾就佛教語義的圖像化呈顯思考過這個問題，認爲“從當代眼光看，佛教美學的生活圖像充滿了思維的擬設色彩，這種擬設使我們既感覺到虛幻不眞，又從其對虛幻不眞的否定中體味到對生命本眞的尊重。”[23] 問題在於，文學圖像的言語視覺化最終是否由文學性言語所制約，目前鑒於外部媒介的圖像化強力干擾，我們尚存有諸多疑問和擔憂，不少文章也因此緣故批判圖像的暴力性氾濫，但我們認爲只要是文學言語完成的，就必然能夠確保文本形態的文學語義性質，這反過來其實也是對一切其他形式化（視覺化、聽覺化）構成的一種統攝。未來文學語義的圖像化呈顯，可能將展示這樣一種潛在的趨勢和本質。正如福柯所言：“因爲現在我們不再擁有那種原始的、絕對初始的言語，語詞基於話語的無限運動而建立並受制於它；從此以後，語言的增長沒有起點和終點，也沒有承諾，它在文學文本日復一日的軌跡中所形成的基本空間中成就著這一意義幻化的往返穿越。”[24]

敍事語義的轉換與拓展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現已經成爲文學話語自律研究的主戰場之一。從最初介入文體和形式的“元敍述”、“文體敍述策略”研究，將“作者的敍事”轉化到“文本的敍事”[25]，到自覺運用西方敍事理論進行中國敍事研究[26]，體現了對敍事語義的縱深掘進，而本世紀以來關於“新敍事學”的研究是學者們關注的一個重點，有學者在總結這方面的進展時指出，中國的新敍事學追求多種方式和多種模式的複數形式“narratologies”的探討，“將研究對象從訴諸語言文字的筆頭敍事與口頭敍事，擴大到了鏡頭敍事以及訴諸其他新興媒介的敍事，甚至超越了文學

[23] 趙建軍：《佛教美學的生活圖像》，《中州學刊》2009 年第 1 期，第 230 頁。

[24]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Routledge,2007. P49.

[25] 陶東風的《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一書汲取了大量後現代的學術思想研究敍述的本體語義及其規律，並結合“先鋒小說”的實驗性敍述進行了細緻集中的文本分析。

[26] 楊義的《中國敍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對中國敍事的結構、表述視角和存在形態進行了系統的闡述與分析。

敍事的範圍進入歷史敍事或其他敍事”[27]，從而在他的研究中如何將文本的不確定敍事與可能敍事，在電腦世界裏充分發揮出來，使“虛擬”、“遞迴”、“視窗”、“變形”這些富有意義的手段用於“電子文本”的敍事，讓文學敍事走出文學，實現歷史敍事與虛構敍事的創新，不僅充分汲取了本文後現代敍事的有益觀點，而且對於維護中國文學敍事的未來生長性，打破“當代藝術終結論”都是很好的推進。

意象、意境語義思辨是語義研究聚焦的又一重要區域。“意象”、“意境”作爲中國文學的傳統概念，在不同時期都有大量的專論。後現代視閾下對“意象”、“語境”語義的討論，體現了比較複雜的情形。一方面，本土文學語義生成的基礎，其理論淵源是屬於本土的，不能從西方或現代的文化基礎來厘定傳統文學範疇的語義內涵；另一方面，傳統文論範疇要用之於當代，就必須對其語義內涵有切合當下的闡釋，這就面臨著如何由傳統而現代、後現代乃至中西語義融合的問題。針對學界有人提出“意境現代化”和“意境世界化”[28]的主張，有學者指出，傳統的意象、意境範疇的“‘建構本身，起決定意義的，是當下、本土文化現實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作爲民族性、時代性極強的範疇，要找到其“現代化”和“世界化”的本體是很難的，因爲它本質上是本土的、傳統的。但傳統文學範疇的語義與現代語義具有文脈發展意義上的聯繫，像：“意象之心理氛圍偏於實有，意境則偏於無、空，意象之美實篤而意境之美空靈。”[29] 這一觀點主張“意象”本質上源于《周易》的“意”、“象”理論，而“意境”更多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近年來，也有學者將“意象”、“意境”範疇納入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結構，有的學者甚至將“言”、“象”、“意”關係作爲文學形象系統生成的邏輯核心，都不失爲很好的探索，但這些探討似乎很難把現代性的複雜意向統攝進來。但

[27] 傅修延：《繼承與創新——新敍事學對文本研究的貢獻》（上），《創作評譚》2004 年第 2 期，第 4 頁。

[28] 古風：《關於當前意境研究的幾個問題：——答王振複兼與葉朗、王文生商榷》，《復旦學報》2004 年第 5 期，第 42 頁。

[29] 王振複：《對〈意境探微〉一書的四點意見》，《復旦學報》2004 年第 5 期，第 34 頁。

我們注意到，也有頗具新意的、將西方現代美學與傳統美學吸納于當前文學元命題語義研究的提法，如將“塊壘”視爲文學語義的本體，認爲“由塊壘引發靈感，進而由靈感產生出富有生命力的核心審美意象”[30]，“塊壘”語義凝合中國古代的“情志說”、“不平則鳴說”、海德格爾的“存在論”、馬克思的“激情本體論”等，在確立當代中國式文學本體語義，特別是文學審美意象語義方面做出了積極努力。

總之，在後現代視閾下，由宏觀意識形態層面和微觀文學自律層面展開的語義研究，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語義的內涵與外延，使中國文學語義的構成足以在核心語義和重要構成環節上形成自足的、有別於西方的觀念體系。但同時也要指出，在這些探討中，有些基於西方現代、後現代認識論出發而形成的語義認識，還沒有達到能夠充分、全面地回應當下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國文學語義問題，特別是後現代文學語義的闡釋與理解，還停留在相對表層的“解構性”理解與知識特徵的一般概括方面，這就需要對文學的後現代語義的一些根本問題，給予正面的討論，以形成清晰和確當的認識。

三、後現代語義：本體與方法

文學語義無法擺脫兩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牽制，一個是宏觀的邏輯層面，因爲宏觀“先在性”的語義賦值，往往是文學存在所不能回避的。文學總是處於時代和文化的宏觀邏輯支配之中。另一個因素是文學事實，經驗主義的創作與批評爲文學提供語義啓示，實際的語義研究必然以當下文學事實爲對象性客體基礎，惟如此，它才能超越當下文學事實形成語義的規則和闡釋系統。

步入後現代語境之後，文學語義的內涵與外延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文學在後現代“場閾”之中的語義認知，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現代性“場閾”的後現代視閾性語義選擇、過濾和拓展，而是要直接在後現代境遇、語境中

[30] 夏之放：《論塊壘——文學理論元問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82 頁。

解決諸個別問題。那麼，中國文學語義從怎樣的途徑著手，才能更好地解決文學語義的未來拓展問題呢？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問題是文學本體語義的問題。現代語義本體保持了理性反思與批判的邏輯統一性。現代語義在揭示諸種矛盾症候時，清理了虛假的意識形態限定，使文學語義向人的本眞存在靠近，其對文學自律性的話語闡發，充分展示了話語增殖的活力。在後現代境遇下，這一切卻將面臨新的質疑，因爲人的存在及文學話語的語義增殖，在後現代本體論理解中並不具有形上規定的統一性與連續性，它更追求斷裂、界限、個體化、變化、延異、區別和差異，它在追求取消“先在性”的過程中實現碎片化（fragmentary）現實的多樣呈現。這樣，傳統文學理論對文學語義的眞値判定就面臨著被否定。或許正因爲這個緣故，迄今人們對後現代的混亂狀況難置可否，因爲碎片化似乎在暗示存在透明性的同時，也暗示了無序與無根的狀況。但實際上，後現代作爲一種思想和文化，最終還是要歸依於語義的規則秩序的，即是說，後現代對於碎片化事實的語義認知，與其按照後現代的語義認知邏輯，尋找符合後現代語義本質的本體描述，在根本邏輯上是超越“碎片化”境遇的。也因此故，目前西方語義學中的後結構語義學傾向頗爲流行，通過後結構的本體論奠基，後現代語義將現代性的矛盾性症候，連同對其解構實現的“碎片化”症候，一起予以邏輯上的根治，在一種似乎語義逆轉的思考中賦予後現代語義以價値眞値，使間斷性分化個體得到自在的呈現，這時的語義系統不再以對現代性矛盾、悖謬的理性“鍋補”爲其特徵，而是以語義爲闡釋仲介推動著文學多樣化存在與知識形態的形成。

因此，可以確認，“碎片化”狀態有其可支撐自身存在的本體語義。從根本性質上說，這種本體語義的邏輯是一種“多”。惟有“多”才成其分散與邊緣化存在。對“多”的邏輯描述，即後現代本體語義的邏輯闡釋。體現在文學語義方面，它表現爲一種基於對象性事實存在的語言描述——“虛構性操作語言”的建構，卡爾納普說：“正確的虛構因堅持把結構意圖視爲物

件認知的理性重構而被選擇。這種重構反映了對象形式化的形式結構。”[31] 卡爾納普認爲，對象性事實的語義重構既有純本體的自由性，也滿足操作規則的直覺願望。中國文學語義的後現代重構從尊重消費社會條件下文學事實斷裂、變異和碎片化事態出發，自覺將操作規則確立在直覺整合了古今中外文學資源的平臺之上。這樣，意識形態的宏觀邏輯和文學自律的微觀話語，在通過“仲介性”語義邏輯平臺時，就形成現時性溝通和聯結，並通過這種聯結徹底否定理性的“先在性”，讓直覺的差異性作爲主導因素構成爲獨特的存在論分延描述，於是，後現代語義邏輯的“多”之本體，就實現了貫穿否定意識于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多重時空的審美分延。

其次，後現代語義拓展所面對的關鍵問題，是話語系統的邏輯分延如何保持其語義眞值的中國特性與全球化“場閾”問題，前一個方面是語義拓展的目的與效力的時間轉換問題，如果不能保持中國特性，則語義之根勢必依託于西方文學理論的基礎，形成語義的殖民化移植。而中國本土文化自古形成的系統與西方後現代迥然有別，能否完成分延性質的語義轉換就要找到切合中國式分延的邏輯規則。在指向未來的邏輯假設中，這種邏輯規則是一個可能成立的命題。因爲傳統中國化思維的整體直覺，強調了相似性的連續，這種語義認知遮蔽了中國文學語義的否定、間斷、個體化綿延的眞實。譬如，意象、語象、境象和意境、境界等的語義分延，並不在於有“意”或“象”的元素構成才成其語義擴展，恰恰是各自明晰的分界及本質的上差異造成了內涵與外延上的延展。依此，則事象、圖像等具有後現代“標記”的概念，與傳統的意象、意境概念一樣具有分延的邏輯相關性。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語義拓展的空間轉換問題，就像前一個問題我們至今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一樣，後一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在市場化消費境遇下，曾經有劇作家、導演首先考慮到這個問題，如 2005 年推出的影片《無極》曾嘗試在電影裏實現中西審美意象的語義“拓展”，但事實上沒有成功，原因是意象的語義邏

[31] Rudolf Carnap. *The Logu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nd Pseudoproblems in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157.

輯基礎是西方化的，影片中讓聖母和天使之類意象負載善惡倫理語義，與中國固有的意象負載方式和內涵理解都構不成對接。對這種意象的語義拓展，我們可以說它在意象的“區別”、“差異”方面做到了足夠的呈顯，但沒有能夠在語義的“邏輯仲介”的理解上形成橫向空間的“分延”，原因是空間上的分延體現爲“場閾”的綿延，而在當時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和基礎。未來的文學語義在古今中外的理論融合“場閾”中呈現高密度的錯落咬合，它會促成方方面面的語義分延，可以推想的是，未來中國文學語義的邏輯必然在全球化場閾中秉持其其個體獨立性，並將中國的個體獨立性貫徹爲後現代文學語義的精華，以眞正實現中國式集合諸多差異性本質的文學話語審美系統。

最後要說明的問題，是指向未來的文學後現代語義的邏輯深化問題。後現代的邏輯深化並不意味著一味的“解構”與“否定”，否定或解構的語義拓展本質上是語義內涵與外延的多皺褶展開和被遮蔽蘊含的直覺化自顯。重構後現代邏輯的“仲介性”闡釋系統，並非以少馭多地重新確立某一單體概念，來統攝諸差異性存在。而是讓“規則”成爲理論操作法則，厘定語義指向的分界與語義分延的區隔性時空，這樣就能保證有充分的可能性納入操作規程，使邏輯深化也得到保證。在這方面，我們以爲後現代語義對壘的方法，對深化邏輯特別有效力。目前西方一些後現代理論家和作家都採用有語義對壘方式。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將物理學和生態學語義值入文學時，提煉出宇宙與晶體、輕盈與沉重、品質與速度的對立性概念，讓它們在敍事中形成對壘，創作出了表達後現代文學語義眞值的新作品；英國小說家大衛．洛奇在小說中對人名，大學名稱等用了對壘性質的語音或語義，如“菲力浦．史沃婁”（Swallow，英文有“燕子”或“吞咽”之意）與“莫里斯．耶．紮普”（“耶”有教名“耶和華”之意）的名字形成對壘，大學名“魯米治”（Rummidge）的發音與“垃圾”（rubbish）的語音也形成潛在的對壘，把它們有效用於揭示後現代境遇下大學教育的潰爛與知識精英的敗落；德國作家黑塞在小說中將魔術和遊戲、音樂與數學的對立意蘊植入小說設計，對直覺的極限之塔進行語義顚覆，使形象、情節和符號的語義對壘形成不同級差的

深化，很好地強化文本的延異感。西方後現代理論家德里達、德魯茲、齊澤克、鮑德里亞等都擅長運用語義對壘的方法解決後現代語義問題，因爲他們所涉及的語義“場閾”非常大，從而各種問題的的語義學認知多與文學語義形成穿插和滲透。譬如，鮑德里亞曾這樣表達消費社會的語義邏輯：“有兩種基本的邏輯相互作用：一個是虛幻的邏輯，主要指向心理分析，其辨別、預測、超驗的整個想像領域，在客體和環境層面上運作的權力和性，以及與房子/車子構成的軸心（內在/超驗）相吻合的特權；另一個是有差異的社會邏輯原理，它是根據社會學來作出區分，而其本身是源於人類學（交往是作爲符號、區分、地位和威信的產物）。”[34] 在這段表述中，語義對壘以虛幻邏輯和社會邏輯作爲最高層面的對壘存在，它們的細化便是不同層面的邏輯、概念和符號運作，在層層展開中對立性語義得以最大限度的呈顯，從而達到語義深層本質的揭示目的。語義對壘可以作爲承載後現代語義分延的基本單位，單一的本體概念，在其邏輯封閉格局中巨細無遺地描述體中之義，難以展現語義存在的矛盾性與複雜性；本體語義的綜合性外延，在邏輯格局上可以以“他者”之域呈現“此在”之“分有”，雖說也可以達到語義的擴張與增殖效果，但對於否定性、虛幻性、斷裂性語義存在，則存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因爲不同系統中相似性的對接，畢竟允可的是存在體的分母基數，並沒有指向特殊的本質實在。因此，必須進入到分延性質的語義對壘層面，才能把不同個體顯示出來，讓不同個體的存在體充分呈顯自身及相關性與連續性，以及基於分延所形成的連續性之轉換。通過這樣的語義對壘方式，在一系列涉及文學理論的根本問題上，文學語義指向未來的後現代拓展就有望成爲可能。

收 件 日 期：103 年 03 月 01 日
審查通過日期：103 年 07 月 29 日

[34] 〔英〕柯林：《大衛斯波德里亞：一個批判性讀本》，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 頁。